

# 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

——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

李 帆

**【提要】** 清朝末年，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作为国粹派的主将，刘师培能够接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承认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方巴比伦而来，显然基于多方面因素。政治上，此说有助于作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中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的主张相吻合。究其实，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不过，两全心态同时也带来了两难困境。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刘师培等人 1907 年后放弃此说，就在于他们无力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关键词】** 刘师培 中国人种 文明西来说 民族主义 国际认同

近年来，从民族、国家认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尤其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关注，出现一系列相关论著。<sup>①</sup> 这些论著或宏观、或微观，从各自视角考察、分析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课题。但时至今日，很难说研究状况令人十分满意，至少在个案研究方面还存在不少缺失，致使研究的深度受到一些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阐释，探讨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力求两全的心态及其所导致的两难困境，从个案入手完善这一课题的研究。<sup>②</sup>

① 较近的研究主要有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所 1994 年版）；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8 期，1997 年 12 月）；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 6 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皇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黄兴涛：《“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巴斯蒂：《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许小青：《1903 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此四文均载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对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美国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曾做过一些初步探讨，但并不完善，尚需解决的问题颇多。见伯纳尔：《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傅乐诗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80 年版。

—

清末,尤其是19、20世纪交替之际,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东西方学者曾做出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有主张来自巴比伦的(拉克伯里),有主张来自亚洲南方的(海盖尔),有主张来自亚洲北方的(蒯督禄弗儿),有主张来自亚洲东方的(冈本监辅),有主张由美洲迁入的(赫胥黎),有主张来自埃及的(岱乌士、户水宽人、币原坦、霓川),也有主张来自帕米尔——昆仑山的(有贺长雄、儿岛昌定),还有主张独自发生的(特孟亚、爱米阿、部来墨尔)。众说纷纭中,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的则是巴比伦和帕米尔——昆仑山两种西来说。<sup>①</sup>巴比伦说的发明者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力主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中国人种和文明都由此来。该说经日本传入中国,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章太炎即是率先信奉并积极为之推波助澜者。与章太炎同调而相互支持者有蒋智由、宋教仁<sup>②</sup>等。

1901年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黄帝起于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于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蕃殖于四方。”<sup>③</sup>此说盛行不衰,1915年袁世凯政权制定国歌时,还取此说,歌词曰“华胄从来昆仑巅”。

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科学的说法所以能在当时风行,固然是由于中外学者出自不同目的大力宣扬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当时的时代特性。一方面,学术上,正值中国古典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融入国际学术潮流是不少学者努力的目标,而这些打着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旗号对中国历史文明所做出的独特解释恰与中国知识界寻求国际认同的期望相符。另一方面,政治上,此时正是甲午战后失败主义情绪笼罩国人之际,同时也是急需走出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与列强抗衡之时,所以对知识界而言,最关键的是要树起民族主义旗帜,以此激发民众。

—

在清末倡导中国人种、文明西来的学者中,国学大师刘师培的议论较为引人注目,他与章太炎相呼应,其主张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粹派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从1903年到1906年,刘师培在其论著中皆征引和阐发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他的主张有一扩展过程,从认同帕米尔—昆仑山说到信从巴比伦说。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中,他认为“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

① 参见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② 有学者认为,宋教仁并不完全认同拉克伯里之说,但也不拒绝这种观点。见普莱斯:《宋教仁与民族认同意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第1037页。

③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文集》之六,第6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后来对巴比伦说也不反对。1904年,他在论及新发现的甲骨文时,便说:“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族民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03页。

方迁入。”<sup>①</sup> 在 1905—1906 年发表的《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他又进而提倡巴比伦说,认为:“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sup>②</sup> “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sup>③</sup> 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师培在认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的同时,运用己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对之加以印证,从而使得该主张更具说服力。

拉克伯里(1844—1894)是法国人,从小生长在香港,接受中国传统经籍的教育,后来前往英国,出任汉学教授,在学术界小有成就。他的主要著述有《早期中国文明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早期(公元前 2300 年—公元后 200 年)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Traditions of Babylonia in Early Chinese Documents*)等,这些著作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主张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巴比伦是发源地。为此,他还专门办了一份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以集中宣扬这一学说。他认为,公元前 23 世纪左右,原居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Elam*)一带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亚—巴克民族(*Bakt ribes*),在其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i*)率领下大举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又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蛮土著部落,势力深入黄河流域,遂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本为首府及都邑之名,西亚东迁民族用之以为自身之称号,即中国古籍所言之“百姓”;昆仑即“花国”,因其地丰饶,西亚东迁民族到达后便以“花国”命名之,所以中国称“中华”。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举出大量中国早期文明相似于巴比伦文明的实例,涉及科学、艺术、文字、文学、政治制度、宗教、历史传统和传说等领域,认为这表示中国文明是巴比伦文明的派生物。<sup>④</sup>

拉克伯里的论著大多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发表,不久传至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 1900 年写作《支那文明史》时曾引用他大部分的理论(《支那文明史》1903 年被上海竞化书局译为中文出版),尤其详细征引了他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相似于巴比伦文明的大量实例,以为确证。<sup>⑤</sup> 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学说,1903—1905 年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他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 *Western Origin of Chi-*

①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重印本,第 603 页。按刘师培在论述中国人种西来问题时,往往以“汉族”、“神州民族”、“华夏族”等词汇指称中国人种。

② 刘师培:《古政原始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 664 页。

③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 2178 页。按刘师培这段议论,基本源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里《中国人种西来之说》一节的有关论述,见观云(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 37 号,1903 年 9 月 5 日。

④ Terrien de Lacoupeñ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Reprint of the edition 1894, Osnabrück, Otto Zeller 1966. PP. 4—25;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London 1887, Reprinted by Ch' 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66. pp. 9—13.

⑤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 1903 年版,第 20—52 页。

nese Civilization)。实际上,前引刘师培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西来的各种议论,基本取材于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和蒋智由的著作,而他们的主张又都源自拉克伯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还将拉克伯里此说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由于教科书的特殊性质,此说得以在社会流传,影响较大。尽管刘师培以及章太炎等人1907年后放弃此说,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有的学校教科书仍将此说奉为定论。

### 三

众所周知,所谓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并非拉克伯里所创,而是来自于欧洲19世纪人类文明源于一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非所有学者所赞同,但却得到部分考古、人类学家的支持,以科学面目出现。<sup>①</sup>在中国,出于传教需要,一些传教士很早便利用此观念提倡中国人种西来说,如在1875年6月5日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刊登了署名“济南牧师”的《盘古氏论》,该文用牵强附会的考证方法,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寻找耶稣基督的神迹,指认《尚书》所记“盘古开天地说”与《圣经》“创世说”同源,上帝的后人“生育众多,分散到四方大洲大岛,各居各地,成为邦国”。“向来不知中华之盛民当列在何名之下,今案考对证东西书籍便得实凭据,能把此枝接在老根上”<sup>②</sup>。在刘师培曾引用过的韦廉臣所著《古教汇参》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话:“该隐子孙渐离故土,一支东迁,为蚩尤及三苗之祖。……挪亚之后由北而东,居于中国,则汉族与苗族为二族明矣。”<sup>③</sup>如此一来,中国文化就成了基督教文化的衍流。很明显,对于中国民众传播基督福音而言,这种观点是颇为有利的。

当然,拉克伯里倡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与先于他的这些传教士的出发点有很大差异。拉氏从小生长在香港,接受过中国经籍的教育,推崇中国文化,但同时又轻视中国人民,这种心态正代表当时西方人中间普遍存在着的矛盾心理。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建立了一个假说:中国文化本为外来,后为“极端保守又不进步”的中国人保存至今。<sup>④</sup>在19世纪那种特定的时代和学术氛围下,拉克伯里创此假说并不奇怪,但对刘师培、章太炎这样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国粹派知名学者而言,他们接受此说的主要因素应在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和学理上的依据。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甲午战后,整个中国都笼罩在失败主义的阴影之下,“天朝上国”纸冕落地,“东亚病夫”嘲讽弥天。对于学者来说,此时拿出一些史实论证华夏民族与西方民族同属优等,以驳斥白优黄劣的论调,实属用心良苦的自安自慰。人类文明源于一并起源于巴比伦的观念,以及中国人种、文明自巴比伦而来的说法,恰给他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他们所要阐述的是:巴比伦文明东下亚细亚,西入欧罗巴,东向者形成东方人种和东方文明,

① 王会昌:《古典文明的摇篮与墓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② 转引自李天纲:《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503页。

③ 刘师培:《攘书·苗黎篇》,《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3页。

④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西向者形成西方人种和西方文明,纵有黄白之异,决无贵贱之分,即“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sup>①</sup>。

具体到刘师培、章太炎这样的国粹派学者,其政治诉求则非仅限于黄白种族平等。因他们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力主在中国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汉族统治的国家。在他们那里,排满兴汉是第一位的政治理想,故多强调中国(汉族)文明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但他们却能接受汉族和中国文明西来的观点。从表面看,这有点不可思议,实则此正与他们的政治目标相符。因为在他们眼里,所谓中国人种实即为汉族,汉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与欧洲民族没什么本质差别。此外,为了论证汉族“种姓”的高贵,刘师培不仅吸纳拉克伯里之论,还曾借鉴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他说:“昔希腊区国人为三级,印度别国人为四类,而震旦上古之初,亦各以种类区贵贱。试观《尧典》一书,有所谓亲九族者,有所谓平章百姓者,有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百姓、黎民何以区之为二级?刘光汉曰:百姓者,汉族之民,乃贵族及公民也(九族即皇族);黎民者,异族之民,乃贱民及奴隶也。”<sup>②</sup>并把历史上的强盛归功于“百姓”,衰弱归咎于“黎民”。这种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服务于当时申言“夷夏大防”、视满族为异种这一排满斗争的需要的。可见,对于立志排满兴汉的国粹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吸取拉克伯里之说以及相关学说,有着他们特殊的政治关怀。

## 四

在清末,国粹派不光是个政治上的革命派别,更主要的是个学术、思想流派,该派知识分子既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更有自己的学术理念。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政治人士,在虑及政治理想的同时,离不开自身的学术理念。作为国粹派的代表,刘师培自然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接受拉克伯里之说,不仅出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且基于学理上的依据。

就学术立场而言,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sup>③</sup>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和“借西学证明中学”。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这种既要“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又要“借西学证明中学”的主张,表明国粹派知识分子既想守护中国国粹,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又深知在当时西风东渐的世界潮流之下,原封不动地固守下去无济于事,只有“借西学证明中学”,才会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刘师培等人能接受拉克伯里之说的逻辑依据和学理依据正在此。一方面,拉克伯里之说是通过尊重和信任中国古典经籍的途径来实现的,合于国粹派学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初衷。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大量征引《尚书》、《诗经》、《山海经》等中国古典经籍,依赖这些经籍证明己说,而非仅是考察巴比伦文化的遗存。这种做法,相符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目标,对刘师培等人颇具吸引力。所以,刘师培、章太炎不仅接受拉氏之说,而

① 章炳麟:《原人》,朱维铮编校:《尙书》初刻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② 刘师培:《攘书·苗黎篇》,《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3页。

③ 《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13期,1906年2月13日。

且以己之深厚的国学素养,为该说补充古史资料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旁证材料。另一方面,拉克伯里对这些古典经籍所给予的具有西方科学性的肯定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制度和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认可,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拉克伯里所引用的古典经籍,不少被今文经学家斥之为“无稽”,而他相信这些文献,在号称是“科学”的研究中大胆使用。在中国学者眼里,这无疑给了这些古典经籍是来自西方的科学性肯定,而且站到了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之说的对立面。<sup>①</sup>不仅如此,他还反对今文经学家强调孔子地位的态度,同意古文经学家对孔子的基本估计。这些自然对属古文经学家阵营、从中学出发吸纳西学的刘师培、章太炎颇具鼓舞作用,使他们将拉氏视为同道,并通过征引其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术立场。

由上可见,承认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实际上反映出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

众所周知,刘师培等人信奉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时间并不长,数年后便纷纷放弃了。所以如此,固然有政治方面的考量,如把黄帝描写成自西而来战胜土著的哥伦布式的殖民英雄,会不自觉地当时西方在东方大陆开拓事业提供现成的借口,因为按照推理,既然汉族在远古取代苗族等土著为“天演”公理,那么汉族以往被满族入主及在以后被更文明的白种所取代,岂不合理?

从主观意图看,国粹派知识分子力图通过主张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求得既保持民族特性又获得国际认同的两全境界,而在现实中,这种两全的愿望恰带来了两难困境。因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把保存国粹放在首位,势必强调民族特性;而追根溯源之后,又说“国粹”来自西方,自古便与西方相合,普遍性的诉求则又占了上风,民族本位丧失掉了。这实际上形成一个悖论,进入两难困境。这象征着一批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国际语境中寻求中国形象新定位的努力未获成功。

(作者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875)

(责任编辑:刘军)

(责任校对:姜芄)

<sup>①</sup> 康有为在其倡今文经学的代表性著作《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上古茫昧无稽考”,引发广泛争论。见《孔子改制考》卷一,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of Marx and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 Wu Y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tarts in the 16<sup>th</sup> century progressively takes on the new formations and the strong tendencies through the furtherance of the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he globalization has becoming a central theme attracting the universal attentions and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ircle of academy.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jor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of Marx and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globalization. It also indicates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globalization i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orld communism.

**The Norm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Orders of State and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 Bu Xianqun**

The state order is the unity both of state's form and government's form. The state's form reflects the national status of various social classes, and the government's form reflects the shape of organization of power. The unity of both constitutes the concrete form of the state order. The social order has the differences of broad meaning and narrow meanings. The former includes all kinds of forms of organization of social groups, such as various social classes and stratum. The later indicates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 of special social groups composed by the elements such as blood relationship, region, economy, religion, culture, and et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der and state order is very complicated, since the social order is not only the crucial ba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rder of state, but also has the possibility to constitute a kind of folk order independ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ancient China.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Identity: Analyze the Hypothesi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est Coming of Liu Shipai // Li Fan**

The hypothesis of western coming of the Chinese race and civilization gained wider popularity at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I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great thinkers and scholars in China that time, such as Zhang Taiyan, Liu Shipai and Liang Qichao. Liu Shipai was much influenced by the study of the French Sinologist, Terrien de Lacouperie and recognized that the core group of the Chinese race and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the civilization of Babylon. It is unthinkable that Liu Shipai favor of this hypothesis, as a radical nationalist against Manchu and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Essence School. But in fact the identity with the hypothesis corresponded with the political aims of the School.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Essence School in academy was to "prove Chinese learning through Western learning". It meant one side they wanted to maintain the Chinese national essence and cultural particularity. The other side they wanted to obtain a kind of universal value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But the attitude of them led to a situation of dilemma. It was the reason why Liu Shipai and others abandoned the hypothesis after 1907.